

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生计适应性选择的影响： 基于“生态依赖—生计福祉”的响应模式

饶品样¹, 耿亚新¹, 张 雅²

(1. 郑州大学管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2. 郑州财经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的适应性选择对推动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生态宜居的乡村建设及农户生活有着重要意义。选择伏牛山河南片区 10 个特色旅游乡村社区为调研地,从微观视角连接乡村旅游社区生态系统及农户生计福祉间关系,构建农户“生态依赖—生计福祉”的生计适应性响应模式,并进一步分析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结果选择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发展乡村旅游可以打破传统固化的生计模式,农户选择高生态依赖增强自身获利能力、抗风险能力等实现生计高福祉发展;(2)人地关系改变是乡村旅游社区农户适应性响应的根本因素,农户经济及社会理性偏好是不同适应性响应选择的内部推力。

关键词:乡村振兴;旅游社区;农户生计适应性;生态依赖—生计福祉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66(2023)05-0064-13

The impact of livelihood adaptability selection of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farmers: Based on the response model of “ecological dependence livelihood well-being”

RAO Pinyang¹, GENG Yaxin¹, ZHANG Ya²

(1. College of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2. Zhengzhou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adaptive choice of farmers in rural tourism communit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and livable villages and the prosperity of farmers. This paper selects 10 characteristic tourism rural communities in the Henan area of Funiu Mountain as the research site. it conn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ecosystem and the livelihood well-being of farmers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constructs a livelihood adaptation response model of farmers’ “ecological dependence-livelihood well-being”, and further analyze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the selection of the results of the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farmers’ livelihood adaptation respon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can break the traditional fixed livelihood model, and farmers can choose high ecological dependence to enhance their own profitability and anti-risk ability to achieve high livelihood and well-being development. (2) The change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is the fundamental factor of adaptive response of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farmers, Farmers’ economic and social rational preferences are the internal thrust of different adaptive response choices.

收稿日期:2022-10-24 修回日期:2023-03-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贫困户生存空间拓展为指向的嵌入式旅游精准扶贫研究”(16CJY047);河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旅融合创新引领下大别山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路径及对策研究”(2020BJJ057);2019 年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项目(2019GGJS006)。

作者简介:饶品样(1979—),男,江西上饶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学、区域旅游规划与开发。通信作者:耿亚新。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tourism community; households' livelihood adaptability; ecological dependence-livelihood well-being

乡村旅游是我国“十四五”时期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重要渠道,是推动乡村振兴宏伟战略实现的关键环节,是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富民工程”,成为实现乡村旅游社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源^[1]。然而,旅游活动作为一种外力介入乡村社区,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将会引起社区人地关系的变迁、资源结构、生态环境等负的外部性。保持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探索旅游乡村的有效适应模式,合理的规避消极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旅游社区可视为一种人地关系下的社会—生态复合系统,社区农户作为乡村社会—生态复合系统内的基本单位,是主动响应并适应系统内外干扰的主体。因此,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问题的研究成果日趋增加^[2-3]。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外部性内化于乡村社区社会—生态复合系统的微观参与者的行为实践,农户既是参与主体和重要的利益相关群体,也是社会生产和消费决策的最基本单位^[4-5],则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生计适应性行为既体现了微观经济行为主体利用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包括供给、调节及文化服务)的过程、途径和方式,也直接决定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可持续性^[2,6]。因此,乡村旅游作为重要的生态与社会经济发展类项目,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双重目标,不仅要从微观农户适应性视角评估旅游发展的减贫致富效果,还要关注社区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特别是厘清乡村旅游对农户生计福祉及生态依赖耦合模式的影响。

因此,本文聚焦于乡村旅游社区微观主体“农户”的生计响应选择,从微观尺度上将乡村旅游地生态系统服务与生计福祉相结合构建农户的生计适应性响应模式,采用标准化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MNL)模型探究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乡村社区农户生计响应选择的影响机制。

一、文献回顾与评述

随着全球资源环境的变化,适应性理论作为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尽管以“人地关系”为主的适应性研究在不断地完善,但研究多聚焦于“国家—区域—社区”整体层面对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生态脆弱性的适应性概念、适应性区域差异及发展趋势^[7-9];主要从自上而下的视角构建分析框架,从整体区域尺度提出响应措施,忽视了微观主体的适应能力变化对区域韧性提高的影响因素。而适应性理论为农户可持续生计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10]。特别是,适应性理论应用于社会领域,当农户面临系列社会问题(城镇化、旅游开发等)干扰下适应行为选择的定性描述及定性分析个体生计适应性感知^[11],或是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运用数理模型从单一要素角度解释个体生计行为的影响因素,缺乏综合考究生态系统内部多重要素交互作用对个体生计适应性结果动态变化的影响。

乡村旅游作为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已成为当今乡村振兴的主要手段。但是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乡村社区也不断涌现出诸多现实问题,乡村资源浪费、乡村旅游项目同质化、乡村社会经济结构及生态环境破坏等系列问题凸显^[3,7,12]。国内外对乡村旅游的研究多从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等单一角度或区域尺度通过静态环境容量工具探讨乡村旅游的效应导向,部分学者涉及微观主体农户参与行为及社区旅游参与效应^[13-16]。同时,面临旅游发展扰动乡村社区复合生态系统的适应性研究成果日益增加,主要关注乡村社区适应旅游活动干扰下的乡村生产空间的重构,及农户对旅游发展的适应能力的评估等^[17-19],但从人地交互作用的角度解释农户及家庭如何适应旅游发展,提升自身生计福祉的研究仍较少,尤其是在旅游干扰下,结合社区生态系统服务与农户生计福祉划分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结果的探索性研究欠缺。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生计福祉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可以视为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的生计福祉^[9],且生态系统中人类活动及福祉状态又会作用于系统

中各类资源的消耗程度,即表现为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价值的影响^[19]。因此,急需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人类生计福祉结合起来构建乡村社区农户适应性分析框架,则本文聚焦旅游地乡村社区的农户,在厘清旅游干扰与天地关系相互关系下,理解乡村社区微观主体层面上农户适应性行为策略及适应能力的动态变化,将社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农户生计福祉相结合构建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模式,并尝试进一步辨明在旅游干扰下农户的动态适应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以期对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益的决策支持和政策建议。

二、理论框架及研究方法

(一) 理论框架

可持续生计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ramework)关注农户生计适应性行为导向路径下对压力(风险)应对的能力与过程^[8]。这个理论框架表现出

农户在遭遇系统外部干扰后,农户生计要素及系统其他要素间相互联系的变动,从而重塑农户生计发展路径,为探索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社区农户的生计适应性选择提供了分析思路^[18]。本文基于适应性理论并借鉴可持续生计框架,以乡村旅游社区的微观主体农户为研究对象,将社区生态系统服务与农户生计福祉相结合划分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模式,构建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的概念模型(见图 1),分析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社区农户生计响应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从图 1 可知,生计适应性响应模式有:高依赖—高福祉(H-H)、高依赖—低福祉(H-L)、低依赖—高福祉(L-H)旅、低依赖—低福祉(L-L),游空间生产重塑乡村人地关系,乡村内部农户社会经济、生态亚系统遭受外部旅游活动的干扰,引致农户生计能力及生计策略的变化,重塑生计响应结果,进行理性行为选择的发展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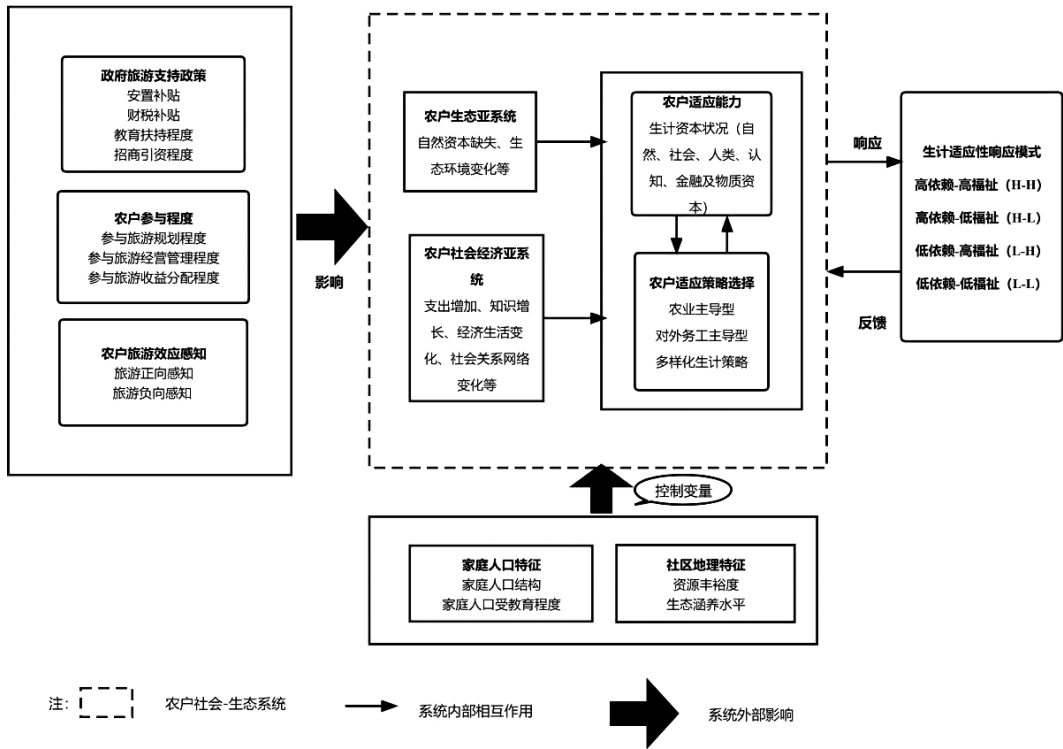


图 1 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社区农户生计适应性选择的概念模型

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乡村社区作为一个复合的社会—生态系统面对旅游干扰,其自身生态亚系统及社会经济亚系统将会发生变化^[20]。随着乡村

旅游开发,农户面临自然资本缺失、生态环境变化等生态亚系统的改变。同时,乡村社区社会经济系统随着旅游活动的日益增强,将会扰动农户原

有的经济、社会生活结构,农户面临支出增加、知识增长、经济生活变化、社会关系网络变化等。农户为取得可持续生计的必要资本、提高自身生计适应能力,将会响应乡村社区社会—生态系统要素的变化,重塑自身的生计策略,进而对农户生计福祉和社区生态系统服务产生影响的作用路径,从而形成农户“生态服务依赖—生计福祉”的生计响应模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指出打造乡村建设发展的总要求。同时,国务院、农业部等相继发布了推动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乡村产业发展规划等系列文件,对旅游业在乡村发展的积极作用予以肯定,明确乡村休闲旅游业是乡村产业发展的重点,是促进乡村振兴、实现三产融合及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3]。乡村旅游的发展对农户生态系统及农户经济社会系统产生冲击与扰动,农户适应旅游发展带来的影响,改善生计资本、调整生计策略以确保生计适应能力与生计适应策略形成高度耦合关系,产生可持续发展的生计结果(高生态依赖—高生计福祉的生计响应模式)。

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社区的农户社会—生态系统面临旅游扰动时会做出自适应响应行为,农户生计适应能力与生计适应策略与社区生态服务价值发生交互作用,遵循“生态系统变动—适应性行为响应—选择适应性结果”的逻辑关系。农户生计适应性行为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户个体心理认知的差异,受到系统外部的政府旅游支持政策及农户旅游参与度、农户对旅游效应感知的影响。

(二) 研究方法

根据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Coleman's Rational Choice Theory),强调从微观个体层面行为选择来解释宏观系统出现的社会现象,理性的个体行为选择既追求最大利益又受社会关系的制约,由行为意图引发,受社会制度和行动者掌握的资源制约^[21]。由于MNL模型是以主体行为随机效用为理论基础,即反映主体效用最大化的行为选择原则^[22-23]。因此,本文综合考虑社会制度、农户理

性行为意图、社区资源状况解构建MNL模型,解释农户适应性响应选择的影响机制。

1. MNL 模型

本文将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模式选择概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对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生计适应性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由于被解释变量生计适应性响应模式为离散型数据,因此本文构建MNL模型分析乡村旅游社区农户适应性响应模式选择的影响机理,建立标准化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为:

$$P(Y=i) = \frac{e^{\beta_i x_j}}{1 + \sum_{i=1}^4 e^{\beta_i x_j}} \quad (1)$$

式中: i 表示4类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模式, $i \in (1=H-H, 2=L-H, 3=L-L, 4=H-L)$ 。 $P(Y=i)$ 表示农户选择第*i*中生计适应性响应模式的概率, x 为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生计适应性选择的影响因素; β_i 表示与选择结果*i*待估计系数。

以模式1:H-H为基础变量与其他类型进行比较,对式(1)变换得出模式*i*选择与模式1选择的相对比估计模型为:

$$\ln[P_{y=i'}/P_{y=1}] = \alpha_{i'} + \sum_{j=1}^n \beta_{i'j} x_j \quad (2)$$

其中: $i' \in (2=L-H; 3=L-L; 4=H-L)$,即构建模型(I)、模型(II)及模型(III)3类情境进行回归分析,其中模型(I) $_{i'=2}$ 表示L-H以H-H作为参照类、模型(II) $_{i'=3}$ 表示L-L以H-H作为参照类、模型(III) $_{i'=4}$ 表示H-L以H-H作为参照类。

2. 熵权法

在权重计算方面,为避免主观确定权重产生较大误差,参考崔晓明等^[20]的研究,选用熵权法对指标数据的权重进行确定。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第一步,构建指标评价矩阵 E' : $E' = (e'_{ij})_{n \times m}$ (3)。其中, e'_{ij} 为第*j*个指标下第*i*个农户的评价值。

第二步,对评价矩阵 E' 作标准化处理。得到 E 为:

$$E = (e_{ij})_{n \times m} \quad (3)$$

则 $e_{ij} \in [0, 1]$ 。其标准化处理公式为:

$$e_{ij} = \frac{e'_{ij} - \{e'_{ij\min}\}}{\{e'_{ij\max}\} - \{e'_{ij\min}\}} \quad (4)$$

第三步, 计算第 j 个指标下第 i 各农户评价的比重为:

$$g_{ij} : g_{ij} = e_{ij} / \sum_{i=1}^m e_{ij} \quad (5)$$

第四步, 计算第 j 个指标的熵值 h_j 为: $h_j = -k \sum_{i=1}^m g_{ij} \times \ln g_{ij}$, 其中, $k = 1/\ln m$ 。

第五步, 计算各维度中第 j 个指标的熵权 w_j 为:

$$w_j = (1 - h_j) / \sum_{j=1}^n (1 - h_j) \quad (6)$$

三、研究区域、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根据研究目的、案例地的代表性, 选取河南豫西伏牛山片区的 10 个乡村旅游社区为案例地进行调研, 获取数据, 并根据理论分析框架选择变量。

(一)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本文就研究样地进行相应的表述, 阐明研究样地选取的科学性及代表性等, 介绍问卷设计使用的方法及设计依据、数据收集的具体方式, 并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

1. 研究区域概括

本文基于研究目的及案例地的代表性, 选择河南豫西伏牛山片区的登封市、栾川县、禹州市及新县作为研究区域。案例地在旅游开发程度、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开发运营、社区参与模式及旅游拉动脱贫效益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且在旅游开发时间上呈现出伏牛山乡村旅游动态发展过程。其中, 登封市和栾川县乡村旅游开发较早, 2020 年被评为全国旅游发展百强县, 随着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旅游发展的不断加快和深入, 旅游活动对当地的生态系统干扰强度很大。一方面, 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 另一方面, 给当地的生态系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压力。禹州市是河南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 境内有伏羲文化、黄帝文化、大禹文化、中医药文化、钧瓷文化等, 而神垕古镇先后被评为“中国钧瓷之都”闻名国内外。新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 伴随着红色旅游的开发逐渐发展。然而, 禹州市和新县在乡村旅游发展及农户

参与程度均低于登封市和栾川县, 农户因缺乏传统生计策略的替代选择, 生计资本整体水平仍比较低。

2.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 2021 年《河南省统计年鉴》及登封市、栾川县、禹州市及新县环境质量公报及当地政府工作报告、统计局、环保局及农业局给出的相关数据等, 并结合课题组在河南伏牛山片区展开的居民生计专项调查, 选择 10 个各具特色乡村为调查问卷的发放点, 实地考察、村委会深度访谈及入户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得, 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法来说明各项指标的发展情况, 并通过熵值法对各指标进行权重处理。

数据收集分为前期预调研和正式调研两个阶段, 课题组基于样本类型多样性及空间布点均衡的抽样原则, 整体考虑各个样本的区位条件、旅游发展程度及方式、资源状况、风貌特征等, 从河南豫西伏牛山片区的登封市、栾川县、禹州市及新县 4 个县市中抽取 10 个自然村, 结合村庄地理特征及农户调研问卷展开实地调研工作。于 2021 年 6 月对 10 个乡村社区的旅游发展状况进行为期两周的预调研, 调查对象为随机走访的部分农户。预调研结果显示, 村干部对本村乡村旅游发展历程最为了解, 包括政府、旅游公司所充当的角色和农户的态度。根据预调研情况对问卷进行修改和完善后, 于 2021 年 8 月至 10 月在乡村旅游社区进行了正式调研。本阶段的访谈仅面向知情的村干部 (主要是村支书和村长), 对当地政府乡村旅游负责人、旅游公司负责人进行电话补充访谈, 针对家庭中年龄为 18~60 岁的人员。同时, 考虑到农户文化程度和问卷的专业性, 课题组采用的是“一问一答”的方式进行问卷调研, 对一些专业性问题进行通俗化解释, 对个别文化水平较低无法填写问卷的调查对象, 代写问卷。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1 750 份。其中, 有效问卷为 1 658 份, 有效率为 94.7%。

3. 调研样本的基本概况

被调查的乡村旅游地社区农户的家庭规模平均为 4.48 人。其中, 家庭中平均劳动力数量为 2.24 人, 家庭常住人口平均为 3.17 人; 家庭受教育程度

构成为专科以及以上、高中、初中、小学及文盲的比例分别为 10.8%、22.1%、47.3%、18.2% 和 1.6%；家庭拥有平均耕地面积平均为 0.26 公顷，林地面积平均 1.62 公顷；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为务农、外出打工及围绕旅游开展的多样化来源比例平均为 8.1%、26% 及 65.9%；家庭平均收入水平为 3.92 万元。

从旅游发展模式上看，本次调研乡村社区旅游发展模式主要包括 3 类^[58]：以景区依托为主的“政府主导 + 农户参与”模式、以农家乐休闲为主体的“政府 + 社区 + 农户”模式及以民俗体验为主体的“社区 + 农户 + 旅游公司”模式，被调查农户人数平均占比为 46.7%、31.5%、21.8%。

基于某项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 50% 以上，本文将乡村旅游社区生计适应性策略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即家庭成员从事农业、林业及养殖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一半以上）、对外务工主导型（即家庭成员离开自身乡村外出打工收入占家庭收入一半以上）及多样化生计型（即家庭成员在自身乡村从事以旅游业经营、农业及非农经营等）。根据 2021 年的乡村旅游社区农户家庭收入数据，从事农业主导型、对外务工主导型及多样性生计农户占全部样本的比例为 21.4%、33.7% 及 44.9%，多样化生计为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的主要生计适应性策略。

（二）变量选择及处理

本文研究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社区农户生计响应选择的影响机制，以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模式为被解释变量，通过测算居民福祉指数及居民生态依赖指数划分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结果的 4 种类型；以政府旅游支持、农户旅游参与、农户旅游感知为解释变量；以社区地理特征及家庭人口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实证分析乡村旅游发展如何影响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选择路径。

1. 被解释变量选择

主要对生计福祉指数及生计依赖指数进行测算，构建农户“生计依赖—生计福祉”适应性响应模式。

（1）居民福祉指数测算

基于《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居民福祉主

要反映人们在物质、精神和健康方面的追求。居民福祉反映居民生活幸福、物质满足、精神向上、身体健康的一种状态，同时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都从不同的侧面描绘个体的这种生活状态。居民生计资本主要指人们在自然、物质、社会、金融及人力 5 个方面的资本存量及形成的生计能力^[8,24]，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居民福祉的基本需求状况。因此，本文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通过居民生计资本的评价反映个体在现有生活状态下的福祉水平。

依据可持续生计框架中 5 个生计资本和 CFPS 中农户生计特征，参照何仁伟等^[25]、赵文娟等^[22]对于农户生计资本指标量化的研究成果，本文构建了居民福祉指数（RWB）评价指标体系，包含自然、人力、社会、认知、物质及金融资本福祉评价体系（见表 1）。

利用熵值法获得各项指标权重后，再根据各指标标准化值和权重构成加权标准模型计算，得出居民福祉水平：

$$RWB_i = \sum_{j=1}^n w_{ij} z_{ij} \quad (7)$$

式中： RWB_i 为第 i 类指标福祉水平； w_{ij} 为第 i 类指标资本第 j 项指标的权重； z_{ij} 为第 i 类生计资本第 j 项指标的标准化值。

$$z_{ij} = \frac{x_{ij} - \min\{x_{ij}\}}{\max\{x_{ij}\} - \min\{x_{ij}\}} \quad (8)$$

（2）生态系统依赖指数测算

Yang 等^[26]最早提出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概念，并构建生态系统服务依赖指数（IDES 指数）。社区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指数是衡量社区生态系统保护情况的指标，IDES 指数等于居民从生态系统服务中获得的净收益与总收入（生态系统中所获得的净收益与其他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收益之和）绝对值间的比值，该指标值越高表示居民对生态系统依赖程度越高^[27]。鉴于社区居民获得收入所付出的成本的差异会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依赖程度的准确量化，研究选取 IDES 指数反映以家庭为单位的社区居民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以提高不同家庭间的对比性^[28]。

表 1 居民福祉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释义与影响性质	权重
居民福祉	自然资本福祉	人均耕地面积	反映农户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取对数	0.52
		人均林地面积	反映农户人均占有林地面积取对数	0.481
	人力资本福祉	家庭劳动力能力	0~6岁学龄前儿童=0,7~13岁青少年=1,14~18岁青少年=3,18~25岁成年人=4,25~60岁成年人=5,60~75岁老年人=2,75岁以上的老年人=0	0.622
		健康状况	非常健康=5,很健康=4,比较健康=3,一般=2,不健康=1	0.182
		受教育程度	家庭中16岁以上成员最高学历。大学本科及以上=5,大专=4,高中/中专/技校=3,初中=2,小学=1,文盲=0	0.196
	社会资本福祉	邻里关系	关系很紧张=1,关系有些紧张=2,关系一般=3,比较和睦=4,非常和睦=5	0.568
		家庭社会地位	非常高=5,比较高=4,一般=3,比较低=2,非常低=1	0.432
	认知资本福祉	旅游参与积极性	非常高=5,比较高=4,一般=3,比较低=2,非常低=1	0.395
		生态保护意识	非常高=5,比较高=4,一般=3,比较低=2,非常低=1	0.615
	物质资本福祉	经营性资产丰富度	家庭所拥有经营性资产(农用耐用品)价值取对数	0.177
		房屋价值	家庭拥有房屋价值取对数	0.823
	金融资本福祉	家庭年收入	家庭年收入取对数	0.585
		获得贷款的能力	非常高=5,比较高=4,一般=3,比较低=2,非常低=1	0.254
		获得补贴的能力	非常高=5,比较高=4,一般=3,比较低=2,非常低=1	0.171

生态系统服务包括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3类,则IDES指数表示从3类子生态系统服务中获得的收益比之和^[28]。IDES总指数计算公式为:

$$IDES_i = \frac{ENB_i}{\sum_{i=1}^3 ENB_i + SNB} \quad (9)$$

$$IDES = \sum_{i=1}^3 IDES_i \quad (10)$$

式中,IDES表示居民对社区生态系统服务依赖总指数,IDES_i表示居民对第*i*种生态系统服务依赖的子指标,ENB_i表示居民从第*i*种生态系统服务中获得的总净收益,SNB表示居民从其他经济活动中获得的收入。本文将居民的生态系统服务净收益分为供给服务净收益(*S*)、调节服务净收益(*R*)、文化服务净收益(*C*)及与生态系统服务无关的其他收益(*NA*),具体指标见表2。

表 2 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指数体系

分类	条目	生态系统服务类型
供给服务净收益	农作物种植收入	S_0
	畜牧业收入	S_0
文化服务净收益	饭店旅游收入	C_1
	生态旅游	C_1
	交通运输	C_1
	其他小生意	C_1
	从事旅游业房屋、土地出租收入	C_1
调节服务净收益	征地补偿收益	R_0
	退耕还林补贴	R_0
	生态公益林补贴	R_0
	农业补贴	R_0
其他收益	利益收益	NA
	外出打工收益	NA

注:0,1 分别表示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直接或间接收益。

(3) 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模式划分

本文参考相关研究,借鉴四象限分类法^[29-30],以社区内居民的生计资本(RWB)为纵坐标*Y*,以社区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指数(IDES指数)为横坐标*X*,建立坐标象限图对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社区农户生计响应模式进行划分,如图2所示。同时,为了消除极端值对指标的影响,采用中位值作为分界,高于中位值则为高,低于中位值则为低,通过对总体有效样本的生态系统依赖指数(见式(9)、式(10))和居民福祉水平(见式(7)、式(8))进行测算,求得社区农户生态系统依赖指数的中位值为0.80,社区农户福祉水平的中位值为4.61。则社区农户生计响应结果可划分为4种状态的“生态依赖—生计福祉”生计响应模式,即模式1为“高依赖—高福祉”模式(H-H)、模式2为“低依赖—高福祉”模式(L-H)、模式3为“低依赖—低福祉”模式(L-L)、模式4为“高依赖—低福祉”模式(H-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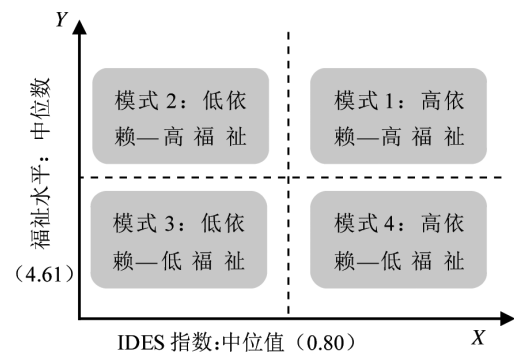


图 1 旅游发展背景下社区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模式划分

2. 解释变量、控制变量选择

基于乡村旅游相关的大量文献及专家建议^[31-32],借鉴已有的对农户生计选择研究的调研问卷,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设计调研问卷。本文主要根据受测者感受和心理认知进行评价,构建5级李克特式影响因素量表(1代表非常低,5代表非常高),则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

(1) 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根据乡村社区社会——生态系统内响应主体的行为选择及心理感知作为解释变量^[33],构建主要影响因素:政府旅游支持、农户旅游参与程度、农户旅游效应感知^[12,24,34]。农户对旅游发展的心理感知决定其如何调整生计策略,采取适应性措施的基础,通过分析农户在感知旅游干扰的前提下,适应性行为选择的各种影响因素。

政府旅游支持对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选择的影响。政府旅游支持反映出政府通过提供物质资源、确保旅游发展环境、保障农户参与机制等制度设计,政府通过宏观的社会经济角度提升农户生计适应性选择的能力。其量表包括:政府对旅游用地安置补贴政策、政府的旅游财税政策支持、政府实施教育培训、政府对旅游发展的招商引资政策4个测量指标^[35-38]。农户旅游参与程度及农

户对旅游效应感知,反映了农户心理认知及行为需求,农户对旅游参与的行为需求强度越大,对乡村旅游感知效应越好,其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主动性越高,并且能够更自觉地参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供给与维持^[39]。其中,农户旅游参与程度量表包括:参与旅游规划程度、参与旅游经营管理的程度、参与旅游收益分配程度3个测量指标^[40-43]。农户旅游效应感知量表包括:旅游正向感知,即旅游开发提高当地经济收益、旅游开发可以提高就业机会2个测量指标;旅游负向感知,即旅游开发引致当地物价上涨、旅游开发导致当地旅游资源及社区环境破坏、旅游开发导致社区人流及交通的拥挤3个测量指标^[44-46]。

(2) 控制变量

借鉴现有研究,本文对可能影响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选择的社区地理特征及家庭人口特征进行变量控制,并根据相关变量的特点将其设定为虚拟变量或连续性变量。其中,社区地理特征量表包括:社区资源丰裕度、社区生态涵养水平2个测量指标^[16]。家庭人口特征主要由劳动力数量(家中是否有老人、孩子、成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2项指标来衡量^[47-48],反映了乡村社区农户响应乡村旅游开发扰动的适应性能力。

表3 变量赋值及量表描述性统计

变量	指标层	指标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政府旅游支持 (GTS)	安置补贴 GTS1	国家对农户旅游安置的补贴政策程度,非常高=5,比较高=4,一般=3,比较低=2,非常低=1	0.625	0.490 3
	财税补贴 GTS2	国家对农户旅游经营财税补贴政策程度,非常高=5,比较高=4,一般=3,比较低=2,非常低=1	0.525	0.505 7
	教育培训 GTS3	国家对农户进行旅游方面的教育培训程度,非常高=5,比较高=4,一般=3,比较低=2,非常低=1	0.575	0.500 6
	招商引资 GTS4	国家对农户旅游进行招商引资程度,非常高=5,比较高=4,一般=3,比较低=2,非常低=1	0.500	0.506 4
农户参与程度 (CP)	参与旅游规划开发程度 CP1	非常高=5,比较高=4,一般=3,比较低=2,非常低=1	1.525	0.505 7
	参与旅游经营管理程度 CP2	非常高=5,比较高=4,一般=3,比较低=2,非常低=1	2.500	0.554 7
	参与旅游收益分配程度 CP3	非常高=5,比较高=4,一般=3,比较低=2,非常低=1	2.325	0.916 7
农户旅游感知 (RPT)	提高经济收益 RPT1	非常高=5,比较高=4,一般=3,比较低=2,非常低=1	3.550	0.714 3
	增加就业机会 RPT2	非常高=5,比较高=4,一般=3,比较低=2,非常低=1	3.700	0.723 2
	社区物价上涨 RPT3	非常高=5,比较高=4,一般=3,比较低=2,非常低=1	3.850	0.622 2
	社区环境资源污染和浪费 RPT4	非常高=5,比较高=4,一般=3,比较低=2,非常低=1	2.875	0.463 4
	社区人流、交通拥挤 RPT5	非常高=5,比较高=4,一般=3,比较低=2,非常低=1	4.400	0.545 4
	社区环境资源污染和浪费 RPT6	非常高=5,比较高=4,一般=3,比较低=2,非常低=1	2.875	0.463 4
社区地理特征 (GCC)	资源禀赋丰富度 GCC1	非常高=5,比较高=4,一般=3,比较低=2,非常低=1	3.525	0.505 7
	社区生态涵养水平 GCC2	非常高=5,比较高=4,一般=3,比较低=2,非常低=1	3.450	0.677 5
家庭人口特征 (FDC)	家庭劳动力数量 FDC2	家庭劳动力数量:8人以上=5,8~6人=4,6~4人=3,4~2=2,2人以下=1	3.400	0.590 5
	受教育程度 FDC3	家庭中16岁以上成员最高学历均值。最高学历赋值:大学本科及以上=5,大专=4,高中/中专/技校=3,初中=2,小学=1,文盲=0	3.100	0.632 5

(3) 量表的共同方差分析及信效度检验

为保障问卷数据的科学性,克服问卷由同一被试者回答产生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在问卷调研填写时先告知研究目的,通过抽样程序控制及统计方法选择规避该问题。采取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对数据进行检验,将影响变量中的 17 个测量指标全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因子中最大解释变异量为 27.98%,表示选取变量数据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同时,对变量信度分析采取 Cronbach's α 及 CR 值进行估计,所有变量 Cronbach's α 系数值为 0.713 ~ 0.824,CR 值为 0.718 ~ 0.895,表明指标数据信度较高,指标数据稳定性较好。采取验证性因子分析(CFA)进行变量数据的内敛及区分效度检验。计算得出变量因子载荷系数大于 0.5,且 AVE 值为 0.496 ~ 0.724,则说明各变量指标收敛效度较好。

四、经验性结果

(一) 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生态依赖—生计福祉”模式比较

1. 不同响应模式下农户生计适应性策略比较

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的 4 类模式下的生计策略情况如表 4 所示。①从总体上看,农户生计适应性策略选择按照占比从大到小分别是:多样化业务型、外出务工型及农业主导型。可见,乡村旅游发展能够吸引农户在当地围绕旅游业从事相关多样化业务,来获取多元化经营收益;②从各类生计策略上看,农业主导型策略,H-L 模式占比最高,农户主要依赖乡村土地来获取自身的收益,收益来源单一且风险较大,则,这类单一土地要素的高依赖经营收益模式对农户的收入增加有限;外出务工型策略,农户主要通过外出打工来获取自身经济收入,改善家庭整体福祉状况,然而却要背井离乡,对社区生态系统依赖较低,忽视对社区生态系统的保护,导致大量土地荒废;多样化业务型,H-H 模式占比较高,农户依赖社区生态系统多元要素服务价值从事多样化业务,一方面农户能够享受到社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依赖的高回报,另一方面农户形成自主反哺生态保护与旅游可持续开发的自觉性,形成了“生态环境保

护—旅游可持续发展—居民福祉提高”的良性循环态势。

表 4 不同“生态依赖—生计福祉”模式下居民生计策略比较

生计策略	1. H-H	2. L-H	3. L-L	4. H-L	合计
农业主导型	$N=176$	$N=18$	$N=18$	$N=217$	$N=367$
	10.62%	1.09%	1.09%	13.09%	22.14%
外出务工型	$N=4$	$N=320$	$N=134$	$N=21$	$N=541$
	0.24%	19.30%	8.08%	1.27%	32.63%
多样化策略	$N=424$	$N=141$	$N=92$	$N=93$	$N=750$
	25.57%	8.50%	5.55%	5.61%	45.24%
总体合计	$N=645$	$N=479$	$N=244$	$N=290$	$N=1\ 658$
	38.90%	28.89%	14.72%	17.49%	100%
Pearson $\chi^2(6)=482.463\ 7\ Pr=0.000$					

2. 不同响应模式下农户生计资本构成比较

乡村旅游社区不同生计响应结果下社区农户生计资本得出(见表 5):①从各类生计资本来看,旅游开发下,农户的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及金融资本较高,其中物质资本最大。反映出乡村旅游社区居民整体物质、金融财富可以增加,同时可以更好地维持社区农户间良好的社会关系。②从四种响应模式来看,在 H-H 模式生计资本总体最大,反映出生计策略多样化能够提升生计资本。对生态系统依赖程度高时,若单纯依靠土地资源要素经营传统农耕地,将会受到生产要素季节性差异的特点,限制生计资本的增加。然而,在多样化生计策略下,通过“旅游+”产业模式,提高对社区生态系统多种要素的依赖程度,不仅可以提升农户整体生计资本,还可以提升农户的社会资本和认知资本,有利于乡村社区良好社会关系的形成与延续、乡村社区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表 5 不同“生态依赖—生计福祉”模式下农户生计资本比较

福祉构成	1. H-H	2. L-H	3. L-L	4. H-L	均值
	$N=645$	$N=479$	$N=244$	$N=290$	$N=1\ 658$
自然资本	0.91 ^(2,3,4)	0.91 ^(1,3)	0.91 ^(1,2,4)	0.91 ^(1,3)	0.91
人力资本	0.98 ^(2,3,4)	0.96 ^(1,4)	0.59 ^(1,2,4)	0.67 ^(1,2,3)	0.86
社会资本	1.32 ^(2,3,4)	1.07 ^(1,4)	0.79 ^(1,2,4)	1.14 ^(1,2,3)	1.14
认知资本	1.25 ^(2,3,4)	0.65 ^(1,3,4)	0.61 ^(1,2,4)	0.98 ^(1,3)	0.94
物质资本	1.36 ^(2,3,4)	1.24 ^(1,3,4)	0.87 ^(1,2,4)	0.91 ^(1,2,3)	1.17
金融资本	1.11 ^(3,4)	1.03 ^(1,4)	0.92 ^(1,4)	0.98 ^(1,2,3)	1.04
生计资本	7.29	6.4	5.31	5.89	6.50

注:括号里的上角标数字表示该模式和其他模式在 5% 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3. 不同响应模式下农户生态系统依赖指数

乡村旅游社区不同生计适应性响应模式下农

户对 IDES 指数情况,见表 6 所示。①IDES 指数中文化服务指数高于供给与调节服务指数,乡村旅游开发下,农户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获取旅游经营相关收入。②从各类服务指数来看,在供给、文化及调节服务指数中,H-H 模式及 H-L 模式均最高,表明旅游开发可以提升农户生态依赖性。③从各类响应模式来看,在 H-H 模式与 H-L 模式中,文化服务指数较高;L-H 模式中各类服务指数变化差异不大,L-L 模式中文化服务指数较低。当农户生态依赖程度低时,农户通过外出打工等非农生计策略可以获取高收入,但离开故乡、耕地荒废、留守老人儿童等生态社会问题逐渐呈现。

表 6 不同“生态依赖—生计福祉”模式下居民 IDES 指数比较

生态依赖指数	1. H-H N=645	2. L-H N=479	3. L-L N=244	4. H-L N=290	均值 N=1 658
IDES 总指数	1.315 ^(2,3)	0.685 ^(1,4)	0.365 ^(1,4)	0.8 ^(2,3)	0.870
供给服务指数	0.48 ^(2,3)	0.21 ^(1,4)	0.185 ^(1,4)	0.23 ^(2,3)	0.300
文化服务指数	0.545 ^(2,3)	0.215 ⁽¹⁾	0.03 ⁽¹⁾	0.3 ^(2,3)	0.315
调节服务指数	0.295 ^(2,3)	0.26 ^(1,3,4)	0.15 ^(1,3,4)	0.27 ^(2,3)	0.250

注:括号里的上角标数字表示该模式和其他模式在 5% 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二)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模式选择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 Stata 15.0 软件,根据式(2)对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模式选择进行多元无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见表 7),得出乡村旅游社

区农户生计适应性选择的影响机制。

对上述影响指标的 16 个因子进行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预测正确率为 81.2%,模型拟合程度指标:Pearson 卡方=229.211, $P(\text{Sig.}=0.000)<0.01$,反映构建的模型具有显著性拟合性;拟合优度指标 $P(\text{Sig.}=1.000)>0.05$,拟合优度较好;伪 R 值均大于 0.5 表示模型整体通过检验。

乡村旅游发展对模型(I)、模型(II)及模型(III)进行多元无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旅游发展对乡村社区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 H-H 模式显著性影响,分别在 5%、1% 的显著性水平下居民生计响应模式由 L-H、L-L、H-L 向 H-H 模式转化。

1. 人地关系改变是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的根本因素

乡村旅游发展打破了社区人地间的平衡关系,农户土地资源的征收及大量非农就业机会的产生,促使农业主导型、外出务工型策略产生适应性转变,多样性的生计策略成为农户适应性策略的主导模式。由于社区旅游开发征地,表现为居民多样性生计策略中收益的主要来源仍是围绕社区生态系统资源、环境等。因此,乡村旅游发展造成的农户土地资源的丧失并不会降低农户对社区生态系统的依赖程度及农户福祉水平。

表 7 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选择的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Ⅰ) $\ln(P_{i' = 2}/P_{i = 1})$			模型(Ⅱ) $\ln(P_{i' = 2}/P_{i = 1})$			模型(Ⅲ) $\ln(P_{i' = 2}/P_{i = 1})$		
		B	Std. Error	Sig.	B	Std. Error	Sig.	B	Std. Error	Sig.
乡村旅游发展		2.313 **	0.231	0.009	2.329 ***	0.227	0.000	1.151 ***	0.245	0.000
政府旅游支持	GTS1	1.297 **	0.450	0.012	2.113 ***	0.420	0.079	2.610 *	0.491	0.031
	GTS2	1.673 ***	0.207	0.000	1.254 **	0.190	0.000	1.621 **	0.214	0.023
	GTS3	0.359 *	0.232	0.072	2.671 ***	0.262	0.000	2.312	0.232	0.331
	GTS4	3.110 ***	0.211	0.000	2.141 **	0.042	0.013	2.312	0.218	0.236
农户参与程度感知	CP1	1.873 **	0.238	0.011	1.312 ***	0.235	0.000	1.352 **	0.242	0.006
	CP2	2.116 **	0.175	0.015	1.871 *	0.155	0.104	0.988 ***	0.195	0.000
	CP3	3.251	0.272	0.379	2.562 ***	0.260	0.000	2.213 ***	0.281	0.000
正向感知	PRPT1	1.349	0.216	0.710	2.231 **	0.816	0.028	1.896 ***	0.809	0.000
	PRPT2	0.973	0.118	0.496	2.124 **	0.108	0.013	1.993 **	0.131	0.114
负向感知	NRPT1	-1.763	0.111	0.029	-0.334 **	0.104	0.013	-0.875	0.118	0.616
	PRPT2	-1.432	0.249	0.009	-0.613 *	0.242	0.027	-0.349	0.241	0.703
	PRPT3	-2.114	0.214	0.305	-0.321 **	0.198	0.112	-0.563	0.222	0.406
社区地理特征	GCC1	1.562 ***	0.231	0.000	2.531 ***	0.213	0.000	1.365 *	0.245	0.075
	GCC2	2.312 ***	0.201	0.000	2.974 ***	0.057	0.000	1.978 *	0.055	0.116
家庭人口特征	FDC1	1.542	0.118	0.004	2.123 **	0.022	0.011	0.776 **	0.025	0.042
	FDC2	2.212	0.134	0.115	2.012 **	0.694	0.029	0.981 **	0.722	0.064
常数项		3.692 *	2.086	0.077	4.234	2.581 **	0.010	4.459 *	2.212	0.137
$Prob > \chi^2$		0.000								
$Pseudo R^2$		0.297								

注: *、** 和 *** 分别表示在 $p<0.10$ 、 $p<0.05$ 、 $p<0.01$ 上有统计学意义。

2. 地方政府旅游支持是提高农户福祉的重要外部推动力

地方政府旅游支持的安置补贴、财税补贴、教育培训及招商引资对模型(Ⅰ)、模型(Ⅱ)都具有显著性影响,反映地方政府旅游支持能够使农户更好参与旅游活动并从中获取利益,旅游活动带来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收益比重提高,增加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向 H-H 模式转变的概率。然而,教育培训、招商引资对模型(Ⅲ)不显著,表明二者对农户福祉提高作用不明显,可能是由于农户自身因素限制了从旅游活动中获取收益。

3. 农户心理感知是生计适应性响应的内生推力

农户参与旅游规划与开发方式、旅游经营管理及旅游收益分配对模型(Ⅱ)、模型(Ⅲ)都具有显著性水平,即农户参与旅游程度越高,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显著从 L-H、H-L 模式向 H-H 模式转变。而农户参与旅游收益分配对模型(Ⅰ)不显著表示出虽然旅游活动能够提高农户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的收益,提升福祉水平。但是,一些居民可能长期在外务工,并且务工收益大于从本社区旅游活动中所获得收益,从而放弃从事本地的旅游活动,仍选择在外务工,从而社区的生态系统依赖程度不高。

农户对旅游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提高就业的感知显著影响 L-L 模式、H-L 模式向 H-H 模式转变,乡村旅游发展对社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正向促进作用能够明显被农户感知,从而选择参与到旅游活动中,提高对社区生态系统的依赖程度并获取高收益;居民对旅游开发的负向感知不显著,在短期内农户为了增加收益而忽视旅游活动带来的成本增加的压力。

4. 家庭人口特征、社区地理特征是居民生计适应性响应的基础因素

家庭人口特征中家庭人口数量越多、家庭受教育水平越高,旅游干扰下居民参与到社区旅游活动中的水平也越高,旅游活动对居民福祉水平提高的可能性越大。而人口数量增加及受教育水平对居民生计模式由 L-H 向 H-H 转变不显著,

居民在外务工所获收益与从社区旅游活动中获取的收益差异不大。社区资源丰裕度及社区生态涵养水平对模型(Ⅰ)、模型(Ⅱ)及模型(Ⅲ)都具有显著性影响,表明社区自身本地的生态系统状况能够显著影响农户的福祉及依赖度。社区本地生态系统状况越好,旅游干扰下农户在处于 H-H 模式的概率越大。

五、结论与对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及展望

本文以伏牛山河南片区的十个旅游乡村为研究区,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分析旅游干扰下乡村社区农户的适应性生计策略下的响应模式(“生态依赖—生计福祉”生计响应模式),并探析影响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模式的影响因素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关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 乡村旅游开发有助于实现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旅游干扰下社区农户生计适应性响应的最优选择为“高依赖—高福祉”模式,即旅游开发提高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依赖度和农户福祉水平。乡村旅游开发有助于农户家庭收入出现多样化生计策略选择,规避了农牧业季节性问题,而旅游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能够延长经营周期并增加经营收益,促使农户选择以旅游为主导的多样化生计。同时,有助于农户形成自觉的生态系保护意识,以保障生计收益的可持续性。

2. 农户适应性响应是在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生态系统失衡条件下作出的理性选择

政府旅游支持制度是农户响应选择的重要外部推动力;农户经济及社会理性偏好(农户旅游参与度及旅游感知效应)是农户响应选择的内部推力;地理资源禀赋、农户家庭人口特征是农户适应响应选择分异的基础因素^[49]。

(二)对策启示

1. 加强地方政府的引导作用

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建立相关社区农户参与旅游的制度保障,保障居民的参与权利,规范居民的参与行为。同时实施多种帮扶政

策,如安排专项旅游发展资金等,采取多种方法提高社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运用旅游干扰的良性机制,促进社区结构的良性优化,提高社区居民生活水平。

2. 把握旅游开发的适度性

旅游开发过多会带来过高的游客量,使得社区的旅游承载力超载,对社区的生态经济系统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单一化的生计方式和经济结构对社区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一旦遭遇突发事件,社区居民的生计将无法维持。

3. 加强社区自我管理和内部建设

社区应建立各种形式的帮扶小组,帮助社区农户了解参与旅游的过程、政策、收益等,提高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积极性。同时开展一系列的教育培训活动,对社区居民进行技能培训和旅游知识教育,增强社区居民的旅游意识和环境观念,增强社区居民的生存能力和技能,以保障社区居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自我发展能力,增强居民收入的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 [1] 陆林,任以胜,朱道才,等. 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研究框架与展望[J]. 地理研究, 2019, 38(1):102-118.
- [2] 史玉丁,李建军. 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同研究[J]. 旅游学刊, 2018, 33(2):15-26.
- [3] 唐健雄,李奥莎,刘雨婧. 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研究[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163(1):174-185.
- [4] 黄震,陆林,苏勤,等.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理论反思与困境突破[J]. 地理研究, 2015, 34(8):1409-1421.
- [5] 尹莎,杨新军,陈佳. 人地系统适应性研究进展:概念、理论框架与方法[J].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2):330-342.
- [6] 李小云. 冲破“贫困陷阱”: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8(14):6-13.
- [7] BIGGS D. Understanding resilience in a vulnerable industry: the case of reef tourism in Australia[J]. Ecology and society, 2011, 16(1):1-2.
- [8]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 [EB/OL]. (2023-01-03) [2023-03-21]. <http://www.nssd.net/references/SustLiveli/DFIDapproach.htm>.
- [9] LACITIGNOLA D, PETROSILLO I, CATALDI M, et al. Modelling socio-ecological tourism-based systems for sustainability [J]. Ecological modelling, 2007, 206(1/2):191-204.
- [10] 尹莎,陈佳,杨新军. 社会—生态系统重构背景下农户适应行为及影响机理[J]. 人文地理, 2020, 35(2):112-121.
- [11] 方创琳,刘海燕.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区域剥夺行为与调控路径[J]. 地理学报, 2007, 62(8):849-860.
- [12] 陈佳,杨新军,王子侨,等. 乡村旅游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及影响机理:基于秦岭景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J]. 旅游学刊, 2015, 30(3):64-75.
- [13] KORSTANJE MAXIMILIANO E. A review of “tourism and socio-environmental effects” [J]. Tourism geographies, 2011, 13(1):160-163.
- [14] JORDAN S J, HAYES S E, YOSKOWITZ D, et al. Accounting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linking ecosystem services to human well-Being[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0, 44(5):1530-1536.
- [15] HOQUE S F, QUINN C, SALLU S. Differential livelihood adaptation to social-ecological change in coastal Bangladesh[J].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7(1):1-13.
- [16] 贺爱琳,杨新军,陈佳,等.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秦岭北麓乡村旅游地为例[J]. 经济地理, 2014, 34(12):174-181.
- [17] 刘智. 旅游产业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的空间格局及驱动机制:以张家界为例[J]. 经济地理, 2020, 40(2):209-216.
- [18] 刘玲,舒伯阳,马应心.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在乡村旅游研究中的改进与应用[J]. 东岳论丛, 2019, 40(12):127-137.
- [19] 陈方,阎建忠,李惠莲. 基于农户生计活动的生计策略类型划分:以重庆市典型区为例[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7, 39(11):113-119.
- [20] 崔晓明,陈佳,杨新军. 乡村旅游影响下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以秦巴山区安康市为例[J]. 山地学报, 2017, 35(1):85-94.
- [21] 文军. 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01(6):19-30.
- [22] 赵文娟,杨世龙,王潇. 基于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研究:以云南新平县干热河谷傣族地区为例[J]. 资源科学, 2016, 38(1):136-143.
- [23] 王济川,郭志刚. Logistic 回归模型:方法与应用[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57-90.

- [24] NUNKOO R, SO K K F. Residents' support for tourism: testing alternative alternative structural model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6, 55(7):847-861.
- [25] 何仁伟, 方方, 刘运伟. 贫困山区农户人力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 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9):1282-1293.
- [26] YANG W, DIETZ T, LIU W, et al. Going beyond the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an index system of human dependence on ecosystem services [J]. *Plos one*, 2013, 8(5):e64581.
- [27] 张超正, 陈丹玲, 张旭鹏, 等. 土地整治对农户“福祉—生态”耦合关系的影响: 基于整治模式与地貌类型的异质分析[J]. *中国土地科学*, 2021, 3(3):88-96.
- [28] 李聪, 康博纬, 李萍, 等. 易地移民搬迁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 来自陕南的证据[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27(11):115-123.
- [29] WANG F C, ZHENG H, WANG X K, et al. Classific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usehold welfare and ecosystem reliance in the Miyun reservoir watershed, China [J]. *Sustainability*, 2017, 9(12): 1-15.
- [30] 李聪, 郭漫漫, 李萍. 破解“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发展困境?: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福祉—生态”耦合模式分析[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9, 33(11):97-105.
- [31] SINGH P K, HIREMATH B N. Sustainable livelihood security index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a tool for development planning[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0, 10(2): 442-451.
- [32] RUIZ B E. Social-ecological resilience and community-based tourism: an approach from Agua Blanca, Ecuador[J]. *Tourism management*, 2010(5): 1-12.
- [33] 贾焱焱, 胡静, 谢双玉, 等. 贫困山区旅游地社会: 生态系统脆弱性及影响机理[J]. *人文地理*, 2021, 36(1): 155-164.
- [34] 吴吉林, 刘水良, 周春山. 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传统村落农户适应性研究: 以张家界 4 个村为例[J]. *经济地理*, 2017(12): 232-240.
- [35] 贾衍菊, 李昂, 刘瑞, 等. 乡村旅游地居民政府信任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 地方依恋的调节效应[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1, 31(3):171-183.
- [36] 胡平波, 钟漪萍. 政府支持下的农旅融合促进农业生态效率提升机理与实证分析: 以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 420(12):85-104.
- [37] LARSEN R K, CALGARO E, THOMALLA F. Governing resilience building in Thailand's tourism-dependent coastal communities: Conceptualizing stakeholder agency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1(21): 481-491.
- [38] OUYANG Z, GURSOY D, SHARMA B. Role of trust, emotions and event attachment on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J]. *Tourism management*, 2017(63): 426-438.
- [39] 李瑞, 殷红梅, 吴殿廷, 等. 旅游对民族社区居民民族认同影响测量及其社区对比[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7, 42(12):68-74.
- [40] 孙凤芝, 刘瑞, 欧阳辰珊, 等. 旅游者感知价值与行为意向关系研究: 基于民宿旅游者的视角[J]. *山东社会科学*, 2020, 293(1):126-133.
- [41] 柴健, 唐仲霞, 白嘉奇, 等. 国家公园背景下旅游地居民参与旅游的能力和意愿关系研究: 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为例[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2, 36(4): 192-199.
- [42] 时少华. 社会资本、旅游参与意识对居民参与旅游的影响效应分析: 以北京什刹海社区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5, 34(3):101-106.
- [43] 赵巧艳. “资本—策略”视角下居民参与民族旅游的路径: 以龙脊景区为个案[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39(3):124-132.
- [44] 汪德根, 王金莲, 陈田, 等. 乡村居民旅游支持度影响模型及机理: 基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苏州乡村旅游[J]. *地理学报*, 2011, 66(10):1413-1426.
- [45] 王金伟, 张丽艳, 王国权. 民族地区居民旅游扶贫参与意愿的影响机制: 一个中介与调节效应的混合模型[J]. *旅游学刊*, 2022, 37(8):40-57.
- [46] 张安民, 赵磊. 感知价值对居民参与旅游风情小镇建设意愿的影响: 以浙江莫干山旅游风情小镇为例[J]. *旅游学刊*, 2019, 34(4):119-131.
- [47] 谭灵芝, 王国友. 气候变化对干旱区家庭生计脆弱性影响的空间分析: 以新疆于田绿洲为例[J]. *中国人口科学*, 2012, 149(2):67-77, 112.
- [48] 李树茁, 梁义成, MARCUS W, 等. 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 基于家庭结构视角的可持续生计分析[J]. *公共管理学报*, 2010, 7(2):1-10, 122.
- [49] VEN S.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perceived impacts, and support for community-based ecotourism in Cambodia: a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6, 21(8):836-861.

(本文责编:王延芳)